

大上海制服地面沉降(2)

◆ 陈正卿



■ 建筑物沉降测量

上下同心协力 管控卓有成效

实际上,在这一报告正式呈报之前的1962年底,上海市委领导已获知这一情况,几位书记都表示了尊重事实的科学态度。当然,这也和一股春风从北京吹来有关。党中央、国务院已下达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八字方针,周恩来,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回来了。上海市委正在研究如何积极贯彻,包括压缩过热的工业发展规模等等。市委指定书记处兼常务副市长(后为市长)的曹荻秋具体负责这项工作。1963年元月2日,曹荻秋就在他主持的第17次市长办公会议上,先请徐以枋代表市地面沉降研究小组作了专题报告。接着,市人委很快转发了市公用事业办及研究小组的报告。1月12日,由副市长张承宗召集,举行了专门会议,参加会议的有各委、办、局和各区、县领导。这次会议其实就是严控地面沉降的动员令,会上决定了两项措施:1.加强观测,在市内10多处建立基岩水准基点,编制城市测量水准,进一步掌握沉降动态信息。2.立即加强对深水井的管理,坚决压缩开采,争取在一两年内以自来水取代深井水。

然而,以上措施的执行情况起初并不理想。除了许多人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地面沉降的长远危害,更牵涉到一些企业尤其是大企业的经济利益。那些原采用地下水的企业,一旦压缩地下水,对生产影响很大,甚至要停掉一些车间,而改用自来水的活,生产成本又将大大提高。一些当年被看做龙头企业的纺织、钢铁、冶炼等大厂,生产任务属国家急

需,自然更强调自己的“特殊性”,以至迟迟不见行动。

徐以枋和研究小组成员很焦急,他们向张承宗等领导反映了上述情况。1964年5月15日,市人委专门召开了第56次市长办公会议,仍由曹荻秋主持。国家地质部也派刘汉生副部长率多位专家专程来上海出席会议。刘汉生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共产党员,建国后曾任辽宁省委副书记,领导鞍山钢铁厂等大型企业,后调到地质部当副部长,还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监委委员。1959年因反对“大炼钢铁”野蛮开采铁矿,被指责为“右倾”,降职到邯郸钢铁厂当副厂长。1962年北京七千人大会后,他获甄别改正,刚回部里复职就风尘仆仆地来到上海。他斩钉截铁地说,中央和国务院对城市地面沉降问题很关心,因为这关系到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。周总理有指示,最近天津也发现了地面沉降迹象,上海一定要拿出经验来,地质部将全力配合。

地质部和上海的合作即从当年开始,指定地质部所属水文地质二大队负责对上海市地面沉降进行监控。这样,在郊区余山和市区7处构成了动态监测网,从田野山脚、河道堤坝、厂区桥头,以至高楼大厦“勒角”等处,增添了近3000个监测点,几乎每平方公里就有10个至18个点,再以点连成线、片,真可谓“天罗地网”。

按照市里的部署,改用自来水的企业需要的资金,由人民银行统筹解决。据老人们说:“那可是专款专用啊,改用水方案一批准,钱就到工厂的账上了,谁还不动啊!”全市企业雷厉风行,仅仅几个月,果断关闭或严控使用的深水井就达80%,

一次就有700余口。自来水厂也加紧扩建,增加供水。那些改用自来水的工厂,产品成本有所上升,他们就想方设法从别的方面节省支出,以达到平衡。对杨浦、吴淞、浦东等压力较大的几座钢铁厂、纺织厂、冶炼厂,分管这方面工作的市领导李干成、张承宗等都亲自去看望,直接下到车间、班组做工作。市中心和几大工业区相继传来喜讯,地面沉降明显减缓了,1965年全市的沉降量已下降到0.059米。

施行夏用冬灌 探索根治之策

通过严控地下水的开采,仅仅是暂时稳住了地面继续大幅沉降,离根本治理还相差很远。1964年春天,一个由他们牵头的新的科技攻关课题启动了,它由几家采用深井水的工厂和高校联手合作攻关。课题的思路是,既然不采用深井水,就可控制地面沉降,那么如果将水回灌到井下,地面会不会回升呢?

为了监测、验证回灌技术控制地面沉降的有效性,在上钢五厂、国棉一厂、上海电化厂、高桥化工厂和外滩、北新泾等处设立了40多组深、低层的分层监测点,证明它确实无误,卓有成效。课题组经过反复试验,在最快时间里攻克了用回灌控制地下水水位高度的难题,并取得了一系列技术数据,这为解决上海以及国内其他城市的同样问题开辟了道路,甚至在国际上也属领先一步。

徐以枋等人想到,上海采用地下水量最大时,一般是在6至9月的夏季生产高峰期,而冬季12月至次年3月生产较闲时使用量较小,那么,能否采用夏用冬灌的方法来获取更多佳

果呢?1965年的进一步试验,证明此法果然可行。1966年经市人委批准,由张承宗副市长最后拍板,正式实行夏用冬灌措施。同时,市领导要求对这两个季节的两次不同的回灌处理,要特别加强监视测量。

事实证明,从1966年起,在上一年已有效控制沉降的基础上,情况愈加明显好转。除了原沉降最严重的吴淞、桃浦等地区,个别的测量点还有微降,大多数地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回升,最大的年回升量为0.002米,这就是说上海地面不仅不降了,还回升了2毫米。夏用冬灌技术同加固加高江河堤坝、疏通市内排水管道,当年被称作加强城市安全的“三大措施”,从而使夏日台风季节常见的马路上、弄堂里因积水可以“趟河”甚至“撑船”的现象,减少了许多。

尽管随后爆发的“文革”大动乱,徐以枋等专家和科研人员都受到了冲击,有几位专家还是从监测点被直接押上“批斗会”的。然而,上海的工人群众和科技人员已普遍认识到,控制地面沉降关系到上海这座城市的安危。许多技术人员一面挨斗,一面仍在坚持研究,不放松监测和管控。即使在最混乱的1967年至1968年,全市绝大部分水准监测点均继续回升,仅个别监测点下降了0.003米。至上世纪70年代末,地面沉降基本得到控制,回灌技术也日趋成熟了。80年代,由于城市建设规模又一次大扩展,地面沉降曾亮起红灯,但很快就被克服了。今天,当我们放心地在上海生活和工作时,不应该忘记那些在上世纪60年代为解决地面沉降难题而付出辛勤努力的先行者。

(摘自《上海滩》2014年第2期)

爱:外婆和我

殷健灵



我做过一件我不愿意做的事。而在我的婚姻问题上,外婆也从未表现出哪怕半点焦灼。至多,她会半开玩笑地对熟悉的人说:“我外孙女,三十多岁了,还没结婚。”有意思的是,我的年龄在外婆心中再也没有增长过,永远是三十岁。过了一些年,当我在聊天时,一再地告诉她我的真实年龄时,她都会吓一跳,吃惊地说:“都这么大了!”可等到下次再问,她又忘记了。于是,再一次小女儿吃惊。

终于有一天,父母都认同并且理解了我的生活选择。爸爸曾经这样安慰我:“一个人没有关系,将来,我和你妈妈走后,可以再投胎回来陪你。”听着这样的话,我的眼泪汪在眼角,强忍住不让它掉下来。或许,他们并不是完全的发自内心的理解认同,我相信的事实是,长辈对子女的爱,永远是无条件的,无论孩子选择了怎样的路,陪孩子走到最后的,一定是最爱你的父母。

当然,我的幸福还比别人多一点——我还有老娃娃一样可爱的外婆。

搬完新家不久,父母去内蒙古旅游,只剩下外婆和我两个人在家。那天傍晚,我突发奇想,对外婆说:“我们去城隍庙玩好不好?”“城隍庙?”外婆的眼睛里露出喜色。那是一个令外婆感到异常亲切的地方。“去啊。”外婆说。

于是,两个人下楼,打车,直奔城隍庙。那是外婆再熟悉不过的地方,夕照中的豫园游人并不多。我搀着她,走过熟悉的南翔小笼馒头店,走过九曲桥,逛过一家家熟悉的扇子店、拐杖店、刀剪店……后来,我们走进了碧波廊酒楼,点了外婆喜欢的龙井虾仁、糟溜鱼片……那时,外婆的脚力还有劲。饭后,又去旧居附近转悠,直到很晚才回家。

那次,大概是外婆和我最后一次单独出行。而之后每回出门,都有父母陪伴在身旁。那晚,外婆情绪很高,思路清晰,断断续续地说着旧事,走得也很快。我仿佛又回到以前只有“我们俩”的日子。到家时,天已黑。外婆或许是走累的,早早洗漱上床。我陪她睡在父母的房间,这样照应起来方便。那一周,我天天和外婆睡在一起,她并不像过去那样惊扰我的睡眠,而是很安静很踏实。大概是因为有我在身边,让她感到安心吧。

7.“调皮捣蛋”的年轻人

这个名次使中国男队“辛辛苦苦四十年,一夜回到解放前”。中国乒乓球队第一次参加世乒赛是1953年3月举行的第20届世乒赛,男团获得的名次是第十名,参加的选手是姜永宁、王传耀、杨开运、冯国诤。1956年参加第23届世乒赛时,男团在姜永宁、王传耀、岑准光、庄家富四员大将的奋斗下获得第六名。从此中国男队没有过比第六名更低的成绩!如果说中国男队第40届世乒赛是开始从珠峰滑落,那第41届就是退到半山腰了。

更令人痛心的是,单项仅有马文革获单打铜牌,王涛、吕林获双打银牌,王涛、刘伟获混双金牌。

女队虽然令人始料不及地在团体赛中丢了考比伦杯银牌,但单项发挥出色。单打中,十八岁的邓亚萍拿下了盖斯特杯,双打陈子荷、高军拿下了波普杯,刘伟与王涛合作拿下了兹·赫杜塞杜克杯。

这样的结果使在第40届世乒赛中遭到重创的男队雪上加霜,人们终于不得不放下幻想面对现实——如果还有人认为第40届失利是带有偶然性的话。

中国乒乓球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,不管是谁做主教练,如果连续四年未能夺冠保冠,不管是什么原因,就得引咎辞职。许绍发自然不想破这个潜规则,他早就在考虑让什么人接自己的班。人们纷纷猜测许绍发或许会召回两年前退役的江嘉良来接任,因为江嘉良是他的爱徒,又是80年代立下汗马功劳勇夺全球的世界冠军。但许绍发在徐寅生、李富荣的报告上写下了他经过深思熟虑的唯一人选——蔡振华。这是许绍发有眼光的精准选择,也是他出于公心的选择。“千军易得,一将难求”,他觉得能率领男队走出低谷打翻身仗的合适人选非蔡振华莫属。许绍发选蔡振华接班可是“蓄谋已久”。当时在国家队待过的国球手和在国外打球或任教的大约有一百多人,许绍发为什么单单向蔡振华发出召回令?一是他了解蔡振华,欣赏他打球就要当世界冠军的鸿鹄大志。

1977年蔡振华调到国家青年队时,许绍发就听说“小蔡有点狂”,怎么个狂法?他说他

要当江苏省第一个世界冠军。许绍发听了心头暗喜:“不想当元帅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!”1979年,第35届世乒赛中国男队遇挫后,全队上下憋着股劲儿要打翻身仗。总教练李富荣大胆起用新人,蔡振华成为打翻身仗的候选主力之一。

蔡振华那年二十岁,给大家的印象是生猛青年,敢说敢做敢犯规,遇见不平事就“拔刀相助”,因而很有人缘。他和上海来的施之皓、曹燕华,排球队的汪嘉伟等人是个“小团伙”,没事就凑在一块儿,谈天说地,当然也少不了将来如何争当冠军这类的畅想。有时聊着聊着就过了熄灯时间,被教练发现免不了批评一顿。他们有时偷偷抽烟玩,也有犯纪律的事儿。

曹燕华曾在她的自传《属虎的女人》中生动描述了这一“小团伙”一次惹祸的经过:

每到周末,就是和一帮江南哥们儿神聊,有汪嘉伟、沈富嶙、施之皓、史美琴,还有江苏的蔡振华、孙志安等一些当红球星。那回一帮人聚在正出国访问的游泳队上海籍运动员大刁房间里,人手一支烟,抽得满房间烟雾缭绕像着了火,抽完的烟蒂随手往打蜡地板上乱扔脚踩灭,结束战斗后打扫战场把所有“作案罪证”都清理干净,免得被教练查铺发现蛛丝马迹。可这回运气不佳,没踩灭的烟蒂在洒了煤油的拖把里慢慢着了起来。快半夜了,有人从窗外经过,发现二楼有房间着火,赶紧报告大楼值班室。好不容易撬开门扑灭已烧黑一面墙的火,我们这“团伙”也就东窗事发……

因而,蔡振华在领导和教练的印象里是“调皮捣蛋”的年轻人。但那时,蔡振华仍然深得李富荣的器重,许绍发的喜爱,因为他有一个最大的优点,就是打起球来特别认真,特别有激情。加之他的打法颇具“秘密武器”的威力,因而李富荣、许绍发并未因蔡振华有些小毛病而影响对他的使用。有几件事给许绍发印象很深。备战第36届世乒赛冬训开始前,蔡振华的腰肌劳损病忽然犯了,起床都费劲,穿鞋袜也弯不下腰。技术训练是不行了,医生建议长跑:“越疼越要跑!”蔡振华二话没说就每天到龙潭湖公园绕着大湖、中湖、小湖跑一圈。

乒乓中国梦

李玲修 王鼎华

